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西方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

朱 荟 郝亚明

当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之时,令人瞠目结舌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的言行却不断喷涌而出。在大众恐慌、媒体鼓吹和政客操弄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不仅成为当前全人类团结对抗新冠病毒肺炎的巨大障碍,也为未来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增添了几分变数。鉴于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间在本质上的对抗性,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过程中必须高度警惕这些因素的深层负面影响。

关键词:新冠病毒肺炎 种族主义 民族主义 仇外主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朱荟,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郝亚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地址:天津市,邮编 300350。

当世界风平浪静之时,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仿佛都被封印在“政治正确”的符咒之下,给人一种得到有效扼制、不得翻身的错觉。然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的爆发,令人瞠目结舌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言论却喷涌而出,冠冕堂皇地出现在部分世界主流媒体之上及一些政治人物口中。面对全球疫情防控中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甚嚣尘上的逆流,联合国相关机构不得不连续发表声明予以回应。2020年3月24日,联合国10个人权条约机构的主席敦促各国领导人,确保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共卫生威胁时,采取积极措施防范种族主义、仇外心理,避免放任民族主义情绪高涨。^①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也多次呼吁,各国要避免因疫情而出现针对特定种族的歧视和侵犯人权现象。残酷的现实警醒我们,当世界各国人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姿态携手对抗“新型病毒”之时,同时必须对抗的还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这些驱之不散的“老牌病毒”。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人权治理”(项目批准号:18JJD810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参见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呼吁在抗击2019冠状病毒病的过程中采取人权做法》, <https://www.ohchr.org/CH/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742&LangID=C>。

一、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是一种较为宽泛的信仰,它相信政治的和社会的结论都能够从“人类划分为在生物学上有差异的许多种族”^①这个观点中推导出来。通常而言,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包括以下三条内容:人类可以被划分为独立的、排他的生物实体——种族;遗传生理特征与个性、智力、道德以及其他文化和行为特征之间存在因果联系;有些种族天生就优于其他种族。任何反映上述种族世界观的行为、实践和信仰,都可以称之为种族主义。^②塔吉耶夫(Pierre-Andre Taguieff)分析指出,人们通常所说的种族主义表现在三个不同的方面:态度(意见、偏见、信仰、倾向等),举止(行为、行动、实践等)和意识形态结构(理论、学说、世界观、现代神话等)。因此,种族主义也相应存在三种意义,即种族主义—偏见,种族主义—行为,种族主义—思想意识。^③由于种族概念自身在科学和政治上都存在巨大争议,因此种族主义的广泛流传与顽固存在就不能仅仅用错误的态度和认知来解释,它在本质上被认为是维护特定种族取得优势地位的一整套嵌入特定文化之中的信仰体系。正如大卫·韦尔曼(David T. Wellman)所指出的那样,种族主义大大超出带有偏见的信仰。种族主义的根本特征不是敌意或错觉,而是对基于种族而衍生优势的制度的捍卫。^④基于这种判断,对种族主义的整体性理解应该包含三个维度:一种社会集体意识;一种制度化的产物;一种社会实践活动。^⑤此三者的紧密结合,使得种族主义成为潜藏在人类社会中难以根除的黑暗力量。

种族主义是违背人类良知的。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西方国家很多有识之士纷纷站出来谴责种族主义的言行并与其展开积极的斗争;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种族主义在西方社会有着一定的民意基础和历史传统。种族主义作为一种源自西方世界的思想观念,其背后有着极为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宗教根源。西方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对全世界殖民时面对其他文明所形成的种族优越感,“科学种族主义”以人类的起源以及不同人种体质上的差异为依据炮制出种族优劣分等的知识话语,神学家通过宗教文本进行合理化阐释等诸多因素共同支撑了种族主义。^⑥还有学者指出,“奴隶制是种族主义的起源,种族主义来自种植园的经济要求”。^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要求的全球殖民、侵略、扩张、奴役为种族主义的生根发芽提供了社会经济基础。^⑧正所谓“种族主义的持续存在意味着它有其有用的一面,即种族主义有其其在心理、社会、政治和制度方面所要达到的目的”。^⑨源于此,种族主义氛围长期在西方国家的政治领域、大众传媒和社会大众之中弥漫,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强

① [英]安德鲁·海伍德著、吴勇译:《政治学核心概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

② 参见 Audrey Smedley, *racism*,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racism>。

③ 参见[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著、高凌翰译:《种族主义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7页。

④ 参见 David T. Wellman, *Portraits of White Rac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8。

⑤ 参见汪诗明、王艳芬:《种族歧视·种族主义·种族和解》,《史学集刊》2016年第2期。

⑥ 参见梅祖蓉:《美国种族主义正当性的来源与建立》,《世界民族》2015年第4期。

⑦ [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著、高凌翰译:《种族主义源流》,第23页。

⑧ 参见马俊毅:《论二战中的极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

⑨ [法]阿丽亚娜·舍贝尔·达波洛尼亚著、钟震宇译:《种族主义的边界:身份认同、族群性与公民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

化的潜藏状态。在日常状态下,它只是被人类良知和政治正确所压制,却从未消逝。

从表现形式上来看,新冠疫情中部分西方国家的种族主义大致可以分为种族主义言论和种族主义行为两种类型。种族主义言论最突出的表现是将新冠病毒肺炎与特定种族或国家联系在一起。早在新冠病毒肺炎爆发之初,西方国家的一些奇谈怪论就暴露了其种族优势论的惯性思维。他们“试图给病毒和疫情贴上种族标签,妄称新冠肺炎为‘黄种人的病’‘新冠病毒只攻击亚裔免疫系统’”。^①有学者分析指出,西方国家在疫情早期的不作为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例外论”的产物,该理论认为病毒和流行病只出现在贫穷的非白人国家。^②当疫情开始在欧美国家快速蔓延之时,西方又出现了将新冠病毒的源头直指中国的苗头。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以现任总统和国务卿为代表的美国官员多次采用“中国病毒”“武汉病毒”这种带有地域指称性而非国际公认的名称来指代新型冠状病毒。联合国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特别报告员滕达依·阿丘梅(Tendayi Achiume)指出,“这种蓄意使用地名来称呼病毒的行为,其根源是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同时也助长了这些心理”。^③而种族主义行为则突出表现为受种族主义言论催生而形成的种族歧视行为,甚至是种族仇恨犯罪。随着将新型冠状病毒与中国进行恶意关联言论的传播,华裔,乃至是整个亚裔都面临着现实的或潜在的种族主义攻击行为。特别报告员滕达依·阿丘梅指出,“在过去两个月,那些被认为是中国人或其他东亚血统的人士遭受了与该病毒有关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攻击。这些攻击包括:恶意诽谤、拒绝提供服务,以及野蛮的暴力行为”。^④联合国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费尔南·德瓦雷纳(Fernand de Varennes)也指出,“针对华裔和其他少数群体在言语和身体上虐待行为的激增,其中一些人甚至被拒绝获得医疗服务和疫情信息”。^⑤伴随着种族主义情绪的增长,一些国家不断发生骇人听闻的种族仇恨犯罪事件。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2020年4月2日得克萨斯州一名男子在超市里持刀攻击一户亚裔家庭,试图杀死他们以“阻止新冠病毒传播”。令人震撼的是,被凶手刺伤的人中甚至包括两岁和六岁的儿童。^⑥而从主体与性质相结合的角度来看,本次疫情中部分西方国家所出现的种族主义言行又可以区分为以下三种表现形式:^⑦

第一种是大众恐慌型种族主义,主要出现在普通民众之中。在疫情爆发早期突出表现为不同族群在自我防护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与文化冲突,一些亚裔人士因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而遭到其他族裔的辱骂攻击。此种言行明显是以我族为中心的体现,借科学和文化之名行种族欺凌之实,赤裸裸地展现了种族等级化的心态和嘴脸。随着疫情在西方国家的扩散与蔓延,同时亦由于新冠病毒传染性较强、致死率较高且尚无有效治疗药物等客观原因,一些西方国家民

① 钟声:《根除种族主义言行刻不容缓》,《人民日报》2020年4月6日。

② 参见 Andrew Liu, “Blaming China for Coronavirus isn’t Just Dangerous. It Misses the Point,” *The Guardian*, April 10, 2020.

③ ④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办事处网站:《联合国专家表示,各国有必要采取行动,打击与2019冠状病毒病相关的仇外言论》, <https://www.ohchr.org/CH/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739&LangID=C>。

⑤ 联合国网站:《人权专家:部分团体和政客利用疫情攻击和排斥华裔等少数群体》,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3/1053742>, 2020年3月30日。

⑥ 参见 Danielle Wallace, *Texas man accused of stabbing Asian family over coronavirus could face FBI hate crime charge*, Fox News. <https://www.foxnews.com/us/texas-man-stabbing-asian-family-coronavirus-fbi-hate-crime>。

⑦ 参见郝亚明:《种族歧视与仇外主义严重阻碍全球疫情防控》,《光明日报》2020年4月3日。

众中逐渐酝酿出恐慌与排斥心理,从而产生了针对华裔,乃至整个东亚族裔的孤立、偏见与歧视,对这些群体的口头辱骂、恶意中伤、暴力对待时常见诸报端。从媒体报道来看,早期有亚裔因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遭受攻击,后期却又有亚裔因在公共场合未佩戴口罩而遭受辱骂,这种荒诞的情节真实而清晰地突显出种族主义的行为逻辑。

第二种是媒体鼓吹型种族主义,主要出现在部分西方媒体之中。随着抗击疫情的不断推进,中国政府采取了包括封锁部分疫情严重地区,建立方舱医院集中收治轻症病人,针对高风险人群采取多种形式的隔离处置,要求民众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等积极措施,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但部分西方主流媒体采取歪曲报道的方式,极力在全世界营造中国应对不力、措施不当的国家形象,并以“剥夺民众自由”“侵犯国民人权”的标签在国际上污名化中国政府。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纽约时报》的双重标准报道:当中国武汉封城以抑制疫情传播之时,它的评论是“让人民付出了生活和个人自由的巨大代价”;而当意大利封锁米兰、威尼斯等地区时,它的评论却是“冒着经济风险来试图遏制欧洲新冠肺炎疫情”。西方媒体这种偏向性的报道,既体现了其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斗争策略,同时也体现了其固有的种族主义视角。美国《华尔街日报》对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评论性文章,其标题居然直接用的是“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德国老牌资深媒体《明镜周刊》使用“新型冠状病毒:中国制造”的封面标题来影射新冠病毒与中国的关系;丹麦、澳大利亚媒体篡改中国国旗、国徽形象,以侮辱性的方式将新冠病毒与中国相联系。西方媒体很多关于中国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新闻报道,正是在这双隐形的种族主义眼镜之下得以生成。此类看似是单纯意识形态导向的新闻报道,其背后同样隐藏着丰富的种族主义想象与种族歧视表达,极易催生西方民众针对特定国家与特定族群的负面情感与偏见。

第三种是政客操弄型种族主义,主要出自一些西方政客之口。在中国政府举全国之力如火如荼地抗击新冠病毒之时,一些西方国家采取隔岸观火的观望姿态,错过了中国积极防控疫情而给世界争取的窗口时机。当新冠病毒开始在这些国家蔓延之时,面对国民的愤怒和指责,不少西方政客采取“甩锅”招数,通过激烈指责中国来转移本国民众的注意力,推卸自身的责任。其中最为恶劣的是以各种手段和借口将新型冠状病毒与中国关联起来,千方百计地将本国疫情的蔓延归咎于中国。正如特别报告员滕达依·阿丘梅所言,“那些试图将2019冠状病毒病归咎于特定国家或族裔的领导人正是那些奉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将带有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花言巧语作为其政治平台核心的领导人”,“针对2019冠状病毒病爆发做出玷污、排斥并使特定人群更容易遭受暴力的政治回应是不能宽恕且不合情理的,违背了各国的国际人权法义务”。^①

随着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进入纵深阶段,种族主义开始以新的形式呈现。如果说前一个阶段的种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对特定种族群体的攻击,这一阶段的种族主义则主要表现为不同种族群体在疫情防控中面临的差别对待。主观上的种族差别对待清晰显现于两名法国医生在电视节目中发表的令人震惊的言论,他们宣称应当将非洲作为新冠肺炎疫苗试验场。^② 这

^①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办事处网站:《联合国专家表示,各国有必要采取行动,打击与2019冠状病毒病相关的仇外言论》, <https://www.ohchr.org/CH/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739&LangID=C>。

^② 参见 Stephanie Busari & Barbara Wojazer, *French Doctors' Proposal to Test Covid-19 Treatment in Africa Slammed as 'Colonial Mentality'*, CNN, April 7, 2020. <https://us.cnn.com/2020/04/07/africa/french-doctors-africa-covid-19-intl/index.html>。

种言论背后有着最根本的种族主义假设——某些种族的价值要高于另一些种族,即使在生命价值上也是如此。而客观上的种族差别对待则表现为一些国家中新冠肺炎感染比例和死亡比例上极其显著的种族差异。2020年4月2日,美国密歇根州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率先公布了该州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病例的种族构成数据,迅速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非洲裔仅占该州总人口的12%,却占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33%,死亡病例占比更高达40%。^①拥有大量非洲裔人口的城市——包括芝加哥、底特律、密尔沃基和新奥尔良在内,正迅速成为新冠病毒的热点区域。通过对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全国统计数据的整理分析,表1显示了拉美裔和非洲裔受到了新冠病毒“不成比例”的影响。拉美裔占美国总人口的18.3%,在新冠肺炎感染者中所占的比例高达32.8%;非洲裔占美国总人口的12.5%,在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中所占的比例高达22.3%。在该机构公布的各州新冠肺炎死亡数据中,几乎所有州中非洲裔的死亡率都名列前茅。从当前的数据来看,至少在堪萨斯州、威斯康辛州、密苏里州、密歇根州、肯塔基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南卡罗来纳州等八个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中非洲裔所占比例为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2倍及以上,其中堪萨斯州和威斯康辛州更是达到令人震惊的4倍以上。正如美国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一项声明中所指出的那样,“几十年来,结构性的种族主义让许多黑人和棕色人口家庭无法获得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负担得起的住房和经济保障,而新冠病毒疫情正使得这些不平等变得更加明显”。^②

表1 美国新冠肺炎感染者及死亡病例的种族族群分布情况

种族族群	占总人口比例	感染者种族族群分布(%)	死亡病例种族族群分布(%)
拉美裔	18.3	32.8	17.1
非洲裔(非拉美裔)	12.5	19.9	22.3
白人(非拉美裔)	60.4	37.4	49.7
亚裔(非拉美裔)	5.7	3.9	5.2
其他(非拉美裔)	3.1	5.8	5.6

注:根据美国CDC网站数据整理,整理时间为2020年7月22日。<https://www.cdc.gov/covid-data-tracker/index.html#demographics>。

表2 非洲裔在美国部分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中占比及其在州总人口占比

州名	死亡病例中非洲裔占比(A)	非洲裔在州人口中占比(B)	A/B
堪萨斯州	25.0	5.7	4.39
威斯康辛州	27.9	6.4	4.36
密苏里州	34.6	11.6	2.98
密歇根州	40.7	13.8	2.95

^① 参见美国密歇根州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网站,https://www.michigan.gov/coronavirus/0,9753,7-406-98163_98173---,00.html。

^② “Coronavirus Deaths Should be Tracked by Race,” *Baltimore Sun Editorial Board*, April 03, 2020. <https://www.baltimoresun.com/opinion/editorial/bs-ed-0403-coronavirus-race-disparity-20200403-npngxilobfa2hm3aishewuj6ui-story.html>。

肯塔基州	17.0	8.2	2.07
印第安纳州	19.2	9.5	2.02
伊利诺伊州	28.2	14.1	2.0
南卡罗来纳州	53.2	26.6	2.0
全美	23.0	12.5	1.84

注:根据美国 CDC 网站数据整理,整理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3 日。https://www.cdc.gov/nchs/nvss/vsrr/covid_weekly/index.htm#Race_Hispanic。

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和处置过程中,美国医疗系统的种族主义也体现得分外明显。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在田纳西州的调查发现,孟菲斯市新冠病毒检测大多数都是发生在以白人为主的富裕郊区,而不是以非洲裔为主的低收入社区;纳什维尔市的新冠病毒检测大部分都是由设置在白人社区的诊所进行,而设置在少数民族社区附近的检测机构却迟迟无法获得相应的检测设备和防护用品。^① 这些地区检测地点的分布表明,不同种族长期以来在获得医疗服务方面存在明显差距。事实上,大多数非洲裔或拉美裔社区的医疗机构往往只能提供质量较低、种类有限的医疗服务,这导致其居民无法获得及时有效的医疗救治。美国一家生物技术数据公司通过分析新冠肺炎早期几个州的医疗账单信息发现,非洲裔美国人在出现咳嗽和发烧症状后就诊时,医生不太可能安排他们接受当时较为稀有的新冠病毒检测。^② 而对于基础疾病发病率较高的少数民族而言,这种延误诊断和治疗是极为有害的。美国联邦政府首席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S. Fauci)承认,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美国不同族裔居民长期存在的健康医疗差距。正是为了消除新冠肺炎疫情中少数民族群体被区别对待的现象,联合国非洲裔人问题专家工作组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结构性歧视可能会加剧获得医疗保健和治疗的平等,从而导致康复结果中的种族差异,并增加非洲裔人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并呼吁各国政府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期间为所有人提供医疗服务时,承诺保证种族公平和平等。^③

二、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内涵极其复杂,它至少包含有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这几种主要类型,而仅仅政治民族主义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自由民族主义、保守民族主义、扩张民族主义和反殖民族主义等多种形态。^④ 在民族主义的本质上学者们存在着不同的判断,有认为是一种思想状态,有认为是一种理论学说,有认为是一种政治运动,学界就在这些分歧

^① 参见 Blake Farmer, *The Coronavirus Doesn't Discriminate, But U. S. Health Care Showing Familiar Biases*, April 2, 2020, <https://www.npr.org/sections/health-shots/2020/04/02/825730141/the-coronavirus-doesnt-discriminate-but-u-s-health-care-showing-familiar-biases>。

^② 参见 Rubix Life Sciences, *Covid-19 and Minority Health Access*, March 2020, <https://rubixls.com/2020/04/01/health-data-in-the-covid-19-crisis-how-racial-equity-is-widening-for-patients-to-gain-access-to-treatment/>。

^③ 参见《人权专家:各国抗疫行动应保证种族公平和平等》,联合国网站,2020年4月6日,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4/1054322>。

^④ [英]安德鲁·海伍德著、吴勇译:《政治学核心概念》,第316-317页。

的基础上构建了形形色色、种类繁多的民族主义界定。^①然而,不管民族主义以何种形态存在,其亘古不变的主题就是对本民族地位和利益的关切。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就指出,民族主义的大多数定义都揭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给予民族以高于一切的关注。所谓民族主义,就是将民族作为关注的焦点并力求促进民族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②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也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③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民族主义的解释是“一种以个人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和奉献超过其他个人或团体利益为前提的意识形态”;^④在《韦氏词典》中,民族主义的界定是“一种民族意识,它将一个国家置于所有其他国家之上,并把主要重点放在促进其文化和利益上,而不是其他国家或超国家集团的文化和利益”。^⑤可见,民族主义表达的大致是两个意涵,一是赋予民族以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以增进民族利益为终极目标。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中的“民族”对应的是英文“nation”,意指由全体国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行动单元是民族国家,而非中文中传统意义上作为文化群体的民族共同体。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族主义实质上指的是对本民族国家地位与利益进行关切的思想状况、理论学说和政治行动。^⑥

与大多数人毫无异议地同意将种族主义贴上邪恶的标签不同,在民族主义性质判定上人们存在着一些争议。“民族主义的规范特征向来就是难以判定的。这是因为民族主义有一种像患精神分裂症的人那样的政治品格。在不同时期,民族主义可能带有进步性和保守性,民主性和专制性,理性和非理性,以及左倾和右倾等两面性”。^⑦尽管从学界到大众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从负面去评价民族主义,但依然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这一点从联合国相关机构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声明中亦可窥一斑,其表述为“要避免放任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而没有说要像对待种族主义、仇外主义一样要完全防范或予以消除。^⑧之所以有这种区分,其根本性原因就在于,在民族国家的时代,民族主义必然存在且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功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应对疫情的单元或主体首先而且主要是民族国家。各民族国家基于保障本国公民生命健康为第一要务的原则,凝聚起本民族的力量、聚集起本民族的资源、鼓舞起本民族的信念齐心抗击病毒,一定意义上彰显了民族主义的正面价值。由于民族主义具有将本民族置于至高无上地位且致力于强化本民族利益的倾向,在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的大局中,就存在主观上或客观上造成有损其他民族国家利益的可能。只要各民族国家在特定事务上的立场与利益不相一致,必然会出现一国认为是正常的行为而被其他国家认为是恶意的行为。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一样,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在其他国

① 参见王联:《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理论》,《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

② 参见[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9—10页。

③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ism, A Report by A Study Group of Members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 Ltd., 1963, p. xviii.

④ Hans Kohn, *Nationalism*,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nationalism>.

⑤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nationalism>.

⑥ 为了摆脱中文表达上的歧义,国内有学者将“民族主义”翻译成“国家主义”或“国族主义”。

⑦ [英]安德鲁·海伍德著、吴勇译:《政治学核心概念》,第318页。

⑧ 参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呼吁在抗击2019冠状病毒病的过程中采取人权做法》, <https://www.ohchr.org/CH/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5742&LangID=C>.

家往往被当作民族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要系统透视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民族主义,就有必要进行温和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二元划分。而二者之间的界限,就在于处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关系时“度”的把握。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哪些行为可以称之为温和的民族主义呢?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不妨将温和民族主义界定为“在维护本民族利益优先的过程中并无主观恶意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随着全球疫情的快速蔓延,很多国家纷纷采取国境管制措施,断绝与疫情严重国家的交通联系,禁止其他国家公民入境本国等。我们还可以看到,考虑到及时有效控制本国新冠病毒传播的现实需要,很多国家在早期对外国公民与本国公民采取一视同仁的免费医疗政策;随着疫情严重程度的上升,这些国家纷纷要求非本国公民承担医疗费用。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诸如此类带有限制性或区别对待的政策无疑都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一定程度上也会有损其他国家或他国公民的利益。但在全球疫情爆发的特殊时期,这些将本国利益置于至高地位的政策的首要更是自保,其目的在于通过民族国家内部的行政措施优先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健康。此种温和的民族主义并没有明显的外向性和进攻性,相反正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自身的魅力所在。此外,为满足国内抗击疫情的需要,不少国家出台法令限制本国医疗器械和防疫用品出口。世界贸易组织2020年4月23日最新统计报告显示,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80个国家和关税地区出台了禁止或限制出口措施,其中绝大多数禁令都是针对口罩、呼吸机等医疗物资。^①与此同时,全世界范围内宣布在特定期限内禁止本国农产品、原料药、防疫用品原材料等出口的消息也是此起彼伏。这些单方面限制性措施无疑将会冲击全球供应链,对其他国家利益和全球抗疫大局带来负面影响,但从性质上判断依旧属于温和民族主义范畴。

在一些强调民族主义负面性并主张遏制民族主义的人看来,所谓民族主义一定意义上指的是只顾本国利益,不顾他国利益。^②正如马克斯·玻赫姆(Max Hildebert Boehm)所做的区分:“从广义上说,民族主义指的是在整个价值系统中将民族的个性放置于一个很高的位置(类似于爱国主义)的态度;而从狭义上讲,民族主义意味着在损害其他价值的情况下的一种特别过分、夸张和排外的,强调民族价值的倾向,结果导致自负地过高评价自己的民族而贬损其他民族。”^③潘维就通过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比,来突显民族主义的外向性与进攻性,“以爱家乡为基础的高尚情感,层层扩展到热爱国家疆界内的社会共同体,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一旦混入对他国社会共同体的歧视,同意为本国利益牺牲他国利益,就是民族主义”。^④从这种狭义角度来看,上文所述的所谓温和民族主义就不属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特指的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所谓极端民族主义指的就是在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之时不惜损害其他国家公民的对等权利的行为,或者说的不惜以牺牲其他国家民众的生命健康以优先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的行为。在此次疫情中,极端民主主义在两个方面表现在最为明显。

^① 参见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Export Prohibitions And Restrictions*, 23 April 2020,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covid19_e/export_prohibitions_report_e.pdf.

^② 参见[英]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18页。

^③ Max Hildebert Boehm, *Nationalism: Politic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1937, XI, pp. 231-232.

^④ 潘维:《别把爱国和民族主义混为一谈》,《环球时报》2015年4月14日。

一是一些国家以各种手段或借口拦截抢夺他国紧急抗疫物资。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的集中爆发,欧洲国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抗疫物资争夺战,导致频繁引发外交事件。其中瑞士沦为这种极端民族主义行径的最大受害者,其购买的医用口罩、消毒水、外科手套等抗疫物资在运输过程中多次被几个邻国所截留。德国、意大利、法国彼此之间也因为截留他国过境医疗物资而不断引发矛盾纠纷。随着境内疫情日渐严重,美国也开始加入到不惜一切手段在世界范围内疯狂抢夺医疗物资的行列。媒体爆料美国在海外通过出高价或强行扣留的方式阻止供货商向已经签署医疗用品购买协议的买家发货,先后截取了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抗疫物资。德国官员因此直指美国违背国际规则,甚至用“现代海盗行为”和“野蛮的西部式做法”来谴责美国。^①

二是一些国家的政客、媒体、社会组织恶意将本国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归咎于中国,并试图提出要求中国道歉赔偿的法律诉讼请求。这些恶意指控除了前文所阐述的种族主义色彩、意识形态对抗和政治性操弄等因素之外,也是这些国家民族主义情绪恶性膨胀的具体体现。如果说将新冠病毒与中国关联起来是赤裸裸种族主义行径的话,那么试图通过所谓的法律或强制手段要求中国承担相应后果则具有很明显的极端民族主义色彩。正如前文所言,种族主义有其心理、社会、政治和制度方面的目的。先通过种族主义锚定“替罪羊”,再通过民族主义寻求自身利益就顺理成章了。在全球抗疫进入关键时刻之际,此类言行无疑就是通过恶意污名化其他国家来转嫁本国问题,妄图以牺牲他国利益来换取本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上的优势地位。

观察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民族主义,欧盟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窗口。欧盟是一个由民族国家让渡部分国家主权而构建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它作为区域一体化的典范,曾与全球化一起被视作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时代式微的标志。然而在英国刚刚脱离欧盟的背景之下,欧盟各国依然未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展现出团结一致的形象,民族主义再度重创了欧盟努力营造的共同体形象。意大利作为此次欧洲疫情的中心,在其医疗体系濒临崩溃之际向欧盟各国发出求救呼吁,然而其他26个成员国对意大利的求助无动于衷,没有任何一个欧盟国家做出了响应。作为欧洲一体化领头羊的法国政府,率先宣布征用全国所有库存和新生产的医疗防护用品;德国迅速出台了医疗物资的出口禁令,并扣押了意大利从海外紧急采购的83万只医用口罩;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等邻国在未通知意大利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对其封锁边境。在整个疫情中,欧盟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各国对医疗物资的哄抢与截留。当然,每一个欧盟国家都可以为其自利行为找到一个正当性理由,那就是保护本国国民是本国政府的首要责任。然而不幸的是,这个赤裸裸的民族主义借口恰恰正是欧盟最不愿意接受的。如果说2010年的欧债危机和2015年的欧洲难民危机中,欧盟各国的表现是各自为战,那么这次的表现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以邻为壑了。正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在《民族主义一统天下》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通过对民族主义强大力量的了解,我们也懂得了今天在欧盟发生的种种事情”。^②

^① 参见 Colin Drury, *Coronavirus: Germany and France Accuse US of Taking Face Masks as International Tensions Rise*, April 4, 2020. <https://news.yahoo.com/coronavirus-germany-france-accuse-us-125611845.html>.

^② Stephen M. Walt, "Nationalism Rules," *Foreign Policy*, July 15, 2011.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nationalism-rules>.

实际上,欧盟从萌芽到成长,无时无刻不在与各成员国的民族主义这个最大的敌人相抗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再次说明了这一点。就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观察来看,世界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普遍处于上升态势,这是一种必然现象也是一种正常现象。疫情是全球性的,但对抗疫情的主体单元却是民族国家。区域性长远利益的一致,并不能代表各国短期利益的一致。欧盟的遭遇侧面提醒人们,当今的世界依然处于民族国家的时代,民族国家依然是人们在面临各种危机时最为坚实的依靠,民族国家依然是一个民族最值得信赖的政治屋顶和生存空间。对此,安德鲁·海伍德(Andrew Heywood)曾直白地指出,“类似欧洲联盟这样的超国家实体在建立合法性和控制公众忠诚的能力上永远不可能与民族国家政府相媲美……欧洲联盟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之中应该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局限,因为有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人们将永远不会把他们自己想象成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成员”。^①

系统性审视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如同历史上每一次大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一样,都会带来巨大的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浪潮。从宏观方面来讲,艰难时刻的民族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对未来国际秩序和战略互信造成严重破坏,因为一国的民主主义行径势必引发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连锁反应。在已有逆全球化趋势的今天,极端民族主义有可能催生进一步的反全球化浪潮。从微观方面而言,民族主义,尤其是极端民族主义必然伴随着仇外心理,使得那些生活在民族母体之外的民众面临冲击,并进而引发各种形式的群体冲突。根据媒体报道,由于法国新冠肺炎死亡率远高于德国,导致德法边境地区部分德国民众产生了攻击性排外行为,一些法国民众被当街辱骂、吐口水、扔鸡蛋等,并被要求滚回自己的国家去。^② 诸如此类的仇外主义现象,正在世界多地频繁上演。

三、全球疫情防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中,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情绪同时高涨并非偶然,因为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种族主义以生物学上的种族所进行的区分,民族主义以政治上的国家(有时也会以文化或族裔)所构建的边界,在疫情的大背景之下,恰好成为了仇外主义的依托和动力,导致对特定种族或特定群体的排斥与仇视。整体而言,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看作是内在根源,仇外主义则是前两者的外在体现。事实上,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还存在彼此交叉、相互强化的关系。例如,反移民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就是保守民族主义,因为它突显了多元文化主义对社会团结和民族统一所构成的危险;而民族主义中也存在着种族民族主义的子类型,其将种族群体视作共同祖先的后裔,因而具有更加强烈与浓厚的排外性意味。^③

历史告诉我们,每当有大的疫情流行,都会导致全球性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情绪的上升。但这些情绪会上升到何种程度,又会产生何种影响,则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国际格局和社会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已经超过半年之久的今天,与之相关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情绪依旧未能消散,一些新的情绪甚至还在进一步酝酿之中。

^① [英]安德鲁·海伍德著、吴勇译:《政治学核心概念》,第315页。

^② 参见《疫情之下法国公民在德法边境受辱》,《欧洲时报》2020年4月13日, <http://www.oushinet.com/europe/germany/20200413/346583.html>。

^③ 参见[英]安德鲁·海伍德著、吴勇译:《政治学核心概念》,第87、316—317页。

此种情形的出现可以放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碰撞的时代背景中来理解。一方面,数十年的全球化进程已经使得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之间高度关联,疫情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堪称史无前例,催生了恐慌性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情绪;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势力近年来有所抬头,新冠肺炎疫情一定程度上又加速了这一趋势,因而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情绪必然随之上升。此外,国际权力转移、国际秩序调整等的现实因素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国际权利竞争上来看,当前正值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的关键时刻,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有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污名化中国的现实需要,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并为己方赢得更多战略筹码。从国际制度竞争上来看,不少人将中国和西方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手段和效果进行对比,也使得疫情自身承载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比较的意义。因而在此次疫情中,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不只是单纯的防御性工具,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进攻性武器。

毫无疑问,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业已成为世界各国携手对抗病毒的巨大障碍。如何克服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的狭隘性与排斥性?与世界主义和共同体主义有着紧密关联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似乎已经成为唯一的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认同并倡导世界的整体性、共同性,认为当代人类面临的问题和有待处理的公共事务,需要从共同的问题、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共同的责任入手,通过确立全球意识、全球价值、全球制度、全球主体寻求解决之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与价值诉求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国家间权利、地位的平等、公正及利益的共享;其二,张扬人类的类主体特征,整体性审视人类的问题,倡导人类的整体利益,关注人类的共同关切。^①新冠肺炎疫情中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盛行既说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立的紧迫性,也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实践的艰巨性。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何如、是否愿意,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流行,深切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远意义,病毒不分国界,全球同此危机,人类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与病毒的斗争,是全人类生死与共的战役。新型病毒的高传染性使得只要有一个国家未能有效控制疫情,全世界抗击疫情的胜利成果都随时会毁于一旦;新型病毒的高致命性亟需全球通力合作以便尽快研制出特效药物和有效疫苗,拯救难以数计危在旦夕的生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讲话指出:“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形势令人担忧。当前,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各国分享防控有益做法,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发,并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③毫无疑问,一旦舍弃

① 参见蔡拓:《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比较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6期。

② 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求是》2013年第4期。

③ 《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重要讲话》,新华网,2020年3月26日。

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这场疫情中世界各国将不得不付出更为惨重的生命健康代价。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中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的泛滥又提醒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任重道远。之前学界在分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挑战时,往往从现实性因素考量入手。如董俊山认为,国家利益的阻隔、国家实力的阻隔、意识形态的阻隔、治理能力的阻隔、历史因素的阻隔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挑战。^① 阮建平等提出现存国际体系中心国家的抵制、国际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和平共处是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挑战。^② 如果以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分析场景,我们可以观察到,即使在这样一个国际社会各方利益空前一致的疫情危机面前,即使在这样一个人类社会只有齐心协力才有出路现实挑战面前,世界各国依然处于一种合作中有对抗、团结中有斗争的混沌状态。在本次疫情防控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尖锐对抗的不仅有上述的现实性因素,更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这些观念性因素。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全人类的一体性,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强调的则是自我与他者的明确划分;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则以零和视角看待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学者们都对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表示悲观,逆全球化浪潮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有所抬头,民族主义情绪有可能进一步冲击国际关系,种族主义也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格局走向的重要塑造力量。新冠肺炎疫情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中,需要高度关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这些理念性因素的深层负面影响。

〔责任编辑 马俊毅〕

① 参见董俊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困惑与破解》,《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2017年第2期。

② 参见阮建平、林一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挑战与建设路径》,《中州学刊》2018年第11期。